

中国文库

· 史学类 ·

长水集
(上)

谭其骧 著



人民出版社

长 水 集

(第二版)

(上)

谭其骧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水集(第二版)/谭其骧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9

(中国文库)

ISBN 978-7-01-008084-0

I. 长… II. 谭… III. 历史地理—中国—文集 IV. 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3904号

责任编辑:孙 牧 陈鹏鸣

整体设计:翁 涌 李 梅

责任印制:王铁生 单浩生

长 水 集

(第二版)

Changshui Ji

谭其骧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

<http://www.peoplepress.net>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6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48.5

字数:1127千字 印数:1—4500

ISBN 978-7-01-008084-0

定价:97.00元(全三册)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 6 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

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文化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计划出版约1000种,分辑出版。自2004年以来,已先后出版三辑,每辑约100种,分精平装两类。2009年时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将“中国文库”第四辑作为“新中国60年”特辑推出,主要收选新中国成立60年来祖国大陆原创性人文社科类名著。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四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邬书林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李东生
杨牧之 宋木文 张小影 柳斌杰 徐惟诚 龚心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马五一 王 涛 王明舟 王瑞书 孙月沐 许 岩 朱杰人
李 岩 李 新 李 峰 李师东 李传敢 杨 耕 汪季贤
汪继祥 刘清华 何建明 何林夏 张增顺 宋一夫 宋焕起
吴尚之 吴江江 吴 斌 林国夫 孟昭宇 单占生 陈庆辉
贺圣遂 贺耀敏 郑宗培 姜新祺 祝君波 郭义强 郭 超
黄小初 黄书元 黄 闽 常汝吉 龚 莉 傅伟中 焦国瑛
董保存 樊希安 潘凯雄

“中国文库”第四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刘伯根

副主任 张贤明

成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汪家明 林 阳

徐 俊 管士光

编辑组

李红强 乔先彪 唐 俭 何 奎 陆 源

自序

这是我的第一部个人著作。作为一个一辈子做学问的人,年逾七十,为什么以前从没有出过一本书,这才是第一部呢?

客观原因是由于:各个时期都有一些比写书更迫切需要应付的业务,不可能腾出时间来著书立说,写上几十万字。解放以前,主要是为衣食而要同时担任几种职务,或同时在几个学校开几门课,经常还要换开新课,终年忙于备课讲课。解放以后初期教学工作仍然十分繁重。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转入以科研为主,先后承担了几项大型集体编写任务的负责人,一项未完又上一项,直到现在还很难预计再过若干年才能摆脱。而我是极不愿意在列入国家计划的集体任务未完成以前自己先搞个人著作的。

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一些主观因素。首先是我写文章出手很慢,一篇东西总是要一改再改才肯拿出去,花的时间比别人多得多。因而在承担着教学工作或集体编写任务时,别人往往可以挤出时间来写出成本专著或大量论文,而我则实在无此能力。

更重要的使我写作特少的主观因素是我对著述的要求较高,我认为,在课堂上可以把别人的研究成果用作自己的讲授资料。所以我教书的胆子相当大,不仅开过中国通史、几门断代史、史学史、文化史、专著研究等课,连不属于本行的地理学、社会学的课也

教过。寒暑假期内说定，一开学就上堂，内容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看法，但大部分都是常识性的或别人阐述过的东西。但我对待著述的态度与此迥然不同。总觉得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识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写它干什么？写一部书至少基本上应自出机杼，人所共知的东西，何必写进去？前人已讲过的话，更不肯照搬。正因为如此，所以自我弱冠之年率尔操觚以来至今已半个世纪，只能断断续续写出一些零星论文，连讲义也没有编成过一部，更不要说撰写有组织有系统的专著了。

说来真正惭愧，不仅成本的书写不出，就是那已发表的几十篇论文，真正能达到自己心目中所悬鹄的者也不多。因而多年来朋友们和几家出版社不止一次鼓励我将这些文章辑成一编问世，我却兴趣不大，迟迟不敢应命。我有我的想法：旧作反正已经发表了，如有人要看，可以在旧刊物上找到，何必再费工夫去搜集汇编？有这个时间，再为集体工作多尽一点力量，或多写一二篇新作，不是更好吗？

我这种想法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变。

一则由于这些年来老一辈学者乃至中年学者出论文集的很多，看到人家都在出，自己也就心动。毕竟已经老了，若及身连自己的论文集也看不到一本，未免有点说不过去。

二则由于发现了有些错误的相传旧说，自己在几十年前业已为文驳正，却由于刊载这些论文的刊物目前已难以见到，以致错误的旧说仍在学术界里继续传播。例如：

1941年我在当时搬迁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的《史地杂志》发表过一篇《播州杨保考》，论证见于宋濂《杨氏家传》（《宋学士文集》卷十一）的，以唐末入据播州的杨氏始祖为“其先太原人”，五传至北宋以同族宋初名将杨业的玄孙为嗣，“自是守播者皆业

之子孙也”这一说法绝不可信。播州土司杨氏先世实为唐代泸叙边徼地区少数民族中的酋豪,后裔渐次汉化,遂依托为中朝名门之后,著于谱牒。宋濂为杨氏撰家传,自当以杨氏谱牒为本,因而传中记载,与史乘显相悖谬之处甚多,自不能因此文出于名家之手而遽尔置信。可是前几年史学界却仍然有人以宋濂《杨氏家传》为据,著文宣扬杨业的后裔在遵义做了几百年的土司。文中没有提到曾经有人否定或怀疑《家传》的可靠性,可见作者显然没有看到过我的旧作,否则他总不至于仍然径以《家传》为据而对拙作不加辩驳。

1942年出版的浙江大学《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上,有我的《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一文,指出了丁文江在其《徐霞客年谱》中所提出的“知金沙江为扬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发见也”一说是完全错误的。实际霞客以前千百年来有许多著作都载明金沙江比岷江更为源远流长,“霞客所知,前人无不知之”,不过前人因为“岷山导江”一语出于《禹贡》,《禹贡》既然被收入作为儒家经典的《尚书》,所以谁也不敢说《禹贡》错了,金沙江才是真江源。霞客“敢言前人所不敢言,其正名之功,诚有足多,若云发现,则不知其可”。这本《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解放后商务印书馆还重印过一次。可是近年来在报刊上为文介绍、宣扬徐霞客的一些作者,大概都没有看到过这本纪念刊,所以在他们的文章里,谈到徐霞客在地理学上的贡献时,依然都袭用了丁文江的那一套。

这种情况还可以列举几件,用不着在这里一一赘陈了。这就促使我感觉到把旧作汇集起来重新发表,不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有此必要的。

自己的想法有所改变了,组织上又大力予以支持,先后委派赵

永复、葛剑雄二位同志帮助我做编选、校定的工作，刘思源同志为我清绘插图，历时二年，始克定稿。三位同志为此都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在此理应致以诚挚的谢意。

全集分为上下两集，上集所收的是解放以前的旧作，下集所收的是解放以后截止发表于1981年的作品。编选的条件很宽，不问精粗深浅，只要基本上可以算是学术性的文字，都被选入了。只有极少数几篇，或由于对文章结论的正确性自己已有所怀疑，或由于当初发表时署的是别人的名字，如今再收入自己的集子似可不必，或由于发表时虽然署了我的名字，实际我只提供了一部分资料，执笔者并不是我自己，这些才在被删除之列。

上下集都是按文章的内容分类编排的，这样也许可以给读者带来一些方便。但不按成文年代的先后排列，读者便不容易看出我各个时期治学述作的经过，在这里我想就此略述梗概。

我在大学里受潘光旦先生的影响，选择了中国移民史作为研究方向。我的毕业论文即以《中国移民史要》为名，全文约七八万字，略述自上古直到清代国境内各族的迁移大势。写成后得到了潘先生的好评，认为经过一番修订补充，可以争取出了一本小册子。但我自己觉得由于题目太大，写得太简单粗糙了，此后就一直没有肯花工夫去充实提高它。进了研究院以后，虽然不久就对魏晋南北朝史、中亚交通史都发生了兴趣，写过这二方面的学期论文，又由于和顾颉刚先生展开了关于两汉州制的讨论，从而提高了我在读大学本科时业已萌发的对沿革地理学的兴趣，但我到选择毕业论文题时，还是舍不得丢开移民史。不过此时的想法与以前已有不同，觉得要研究移民史，应该一个地区一个地区逐步搞，或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逐步搞，而不应急于搞全面的史略、史要或简史，

搞清楚当前各地区人民的来历,才是研究移民史的首要课题。于是我决定主要根据地方志中的材料,按今省区一省一省地搞,先从材料比较好找的湖南省做起。半年之后,我写成了《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一文,通过答辩,毕业于研究院。又半年,1932年6月,刊载于燕京大学的《史学年报》,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翌年,南京中央大学所办《方志月刊》要求转载。此时我已放弃了一省一省写下去的念头,便把标题改成《湖南人由来考》以应之。但这篇文章只说明了出于汉族血统的湖南人的由来,在撰写此文搜集材料过程中,我又发现了近代的湖南“汉人”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出于少数民族血统,因而在1933年又写了一篇《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此后我的主要研究方向虽然转向了沿革地理,但对一地区人口的来历仍然很感兴趣,所以1935年一到广州,即有《粤东初民考》之作;1940年一到遵义,即有《播州杨保考》之作。除了按地区研究之外,同时也还选了几个特定时代做研究,1934年先后发表了《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和《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二文。在研究移民史的过程中,不免要牵涉到对少数民族族源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因而后来在四十年代又写了两篇论述十六国北朝时代丁零族和一篇考证羯族的文章。

我在中学时代就对地理发生兴趣,特别喜欢看地图;在书报上看到一个不熟悉的地名,定要在地图上找出它的位置来。我的两个兄弟同样有此兴趣。记得有几次在寒暑假期内,我们兄弟间常常以考问某一个县名在哪一省哪一部分作为游戏,有时甚至还要问到这个县的四周是哪些县。在大学学习时代,我曾把历代正史地理志大致翻过一遍,注意到地方行政区划的变迁。有了这个基础,所以我当研究生时才会在班上对顾颉刚先生讲义中讲到的西

汉十三刺史部制度提出异议,开展讨论。(讨论函件当时由顾先生作为他的《尚书研究讲义》的附录印发给班上同学,1980年才作为史学界的一件档案由我交《复旦学报》发表。)这就更提高了我研究沿革地理的兴趣和信心。那年冬天我完成了毕业论文,虽然还没有正式取得研究生毕业证书,已有可能离校找职业。(那时燕京的研究生学制定为两年毕业。如果到时学分未读满或论文未写成,可以再拖上一二年。如不到两年学分已读满,毕业论文已通过,就可以不再留在学校里,但仍要到满二年时才算正式毕业。)寒假期间我的伯父把我推荐进北平图书馆当上了馆员。事有凑巧,原在辅仁大学历史系担任教中国沿革地理一课的柯昌泗先生,因家庭纠纷仓促离开北平。春季开学在即,学校不便将这门原定一学年的课程半途停开,一时又找不到有名望有资历的老教师接替这门课。正在为难,我的老师邓之诚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便向当时辅仁的代校长沈兼士先生竭力推荐我去接替。这个偶然的机 会,竟把我这个尚未正式毕业的研究生推上了大学的讲台。

1932年春我开始教中国沿革地理这门课。二年之后,顾颉刚先生又邀我协助他创办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旨的“禹贡学会”,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从此沿革地理——后来改称历史地理——便成为我一生治学的主要方向。

可是,从1932年春到1934年底这三年,除教课外还得为北平图书馆做编目工作,1934年春以后又要为《禹贡半月刊》做编辑工作。并且教书往往不止一个学校,同时教上二三个学校;教的也不止一门沿革地理,还开过两门断代史。从1935年秋到1936年夏,离开北平到广州学海书院任教,又不得不停开沿革地理改开史学名著《通鉴》、《通典》、《通考》研究。1936年秋回北平,除在燕京、清华两校历史系开沿革地理外,又在清华社会系开中国近代社会

研究。抗战初期二年半留在燕京,除沿革地理外又得新开中国地理。所以从1932年初到1940年初这八年之内,能从事写沿革地理方面的文章的时间大致不到一半。这一时期除为《禹贡半月刊》写了一些以考订校正正史地理志为主的短文外,较长的有《新莽职方考》、《清代东三省疆理志》;也写了少数书评,其中较有分量的是《渤海国志长编评校》。

1940年春离开北平到贵州进浙江大学任教,1946年秋复员到杭州,直到杭州解放。在这九年半内,除教中国历史地理外,还教了中国通史、断代史、文化史、史学史等课,大部分时间仍花在备课教课上。又编绘了几幅用土纸石印的历史地图。所以述作还是很少。除上面已提到的有关移民和民族史的几篇外,历史地理方面较有分量的是《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秦郡新考》和《秦郡界址考》三篇。同时对辽史也研究过一阵,但取得的成果更少。

解放后第一学年仍在浙大,历史系停办,这一年专一学习马列主义,不教书,也不写作。第二年转来复旦。开始四年半除半年下乡搞土改,半年思想改造外,全力从事教学工作,教的是中国通史第二、第三两段,每星期都有六七节课。这一时期几乎停止了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只在1953年为顾颉刚、章巽二位先生所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古代史部分》作了一番校订工作。

从1955年春起,此后约二十年中,只开过两学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的课,除参加政治活动和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止工作三年外,全部力量差不多都放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上,能够挤出来写一些东西的时间甚至比以教书为主的年代更少。这一时期的述作主要是:

(1)1959年响应百家争鸣的号召,参与了关于评价曹操,讨论

蔡文姬生平、作品等课题的争论,对郭沫若同志的论述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2)1958年邻近上海市区的江苏省十县划归上海市管辖,1959年起在这些新划入上海市的西部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报刊上一时刊载了许多文章说解放前中外学者说上海成陆历史不过一二千年都说错了,现在考古发现证实上海历史至少已有五六千年。我觉得解放以前的“上海”和1958年以后的“上海”所指地域范围相差太大,前者都在冈身以东,后者包括了大片冈身以西地区,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解放前说那时的上海成陆不过一二千年并没有错。搞科学研究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硬说解放前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述全是错的。因而从1960年起,我写了几篇关于上海成陆年代兼及上海得名和建镇年代的文章,目的端在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指出现今约有六千平方公里面积的上海市成陆年代先后相差达几千年,这几千年内海陆变迁极为复杂,既不能看作大陆不断在以同一速度向外涨,更不能因在西部发现了五、六千年前的文化遗址就说全上海的历史都有那么久。

(3)1957年春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西汉河北地区时,发现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中的西汉河北水道画得不符合于《汉书·地理志》记载,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证明《说文》、《水经》又有讹误;西汉时河北平原诸大水是分道入海的,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合流于天津形成海河水系。由此又不得不进而探索河北平原水系由分道入海演变为合流入海,亦即从《汉书·地理志》时代的情况逐步发展为《水经注》时代的情况的过程。正好碰上复旦大学在5月27日召开校庆学术报告讨论会,我便把这一番探索成果在历史系作了一次题为《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的报告。当时由于时间匆促,来不及写成论文,只写了一个报告提纲,附以几

篇用文言文写的考证水道变迁的笔记,打印分发给听众,并由邮寄发了几十份给有关单位和历史地理界的朋友。会后因忙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图集》工作结束后又忙于其它工作,竟直到今天还抽不出时间来把当时的报告提纲改写成正式论文付诸公开发表。但1957年印发报告提纲后因各方来函索取者甚多,又曾两次加印各数十份以应需求。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自己有所发现,尽管还没有写成论文正式发表,既然人家急于想知道、利用此项研究成果,我认为不应保密,应该有求必应。自1957年至今二十多年,已有许多书刊、论文、历史地图采用了此项研究成果,我从不以此为忤。但想不到去年竟有人(我曾寄赠报告提纲给他)以此为主要内容,写了一篇专文公开发表,文末还说这是他多年钻研的收获,这就不能不使我吃惊了。此人在学术界已有一定地位,不知何以竟无视科学道德一至于此?宁不可叹!

同年夏,我应侯仁之同志之邀去青岛,在疗养所里住了一个月,为他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撰写其中《汉书地理志选释》那一部分。我只注释了全志一百零三个郡国中的六个郡,却在认真阐释的过程中,发现不仅在中原地区的河南河北,就是在西南的云贵高原,西北的河西走廊,《汉志》的水道经流都有和后世不一样的地方。这也就是说,全国许多地区的河流在历史时期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解放以前我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政区沿革范围以内,从这一年起,才扩展到了水道变迁的研究。

研究河北平原水道的下游及其海口必然要牵涉到渤海湾海岸的变迁问题,因此到1965年又写了一篇《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不过我写的有关海岸变迁的文章倒并不始于此篇,这以前研究上海成陆年代的文章实际上也就是研究长江口南岸的海

岸变迁。

(4)三十年代中期禹贡学会同仁提出要把旧时代的沿革地理改造为现代的、科学的历史地理。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把研究广度从疆域、政区、都邑、河渠等几个项目扩展为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各个领域;二是把研究深度从满足于考证描述地理现象的变化,推进到探索这些变化的原因和规律,而后者难度一般有过于前者。五十年代以前,我在这方面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成就。多数文章只谈各个时代的具体不同情况,不谈何以会变;少数文章仅仅是语焉不详地带到几句。进入六十年代,才有所突破。

五十年代以前我讲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时,每次讲到历代黄河的变迁,除要讲到历史上历次重要决溢改道外,一般还要把历史时期分成几个段落,指出各个段落的不同情况,哪几段决溢频仍,不断改道,哪几段相对地平静无事。但我一直讲不清楚何以不同时期会出现迥不相同的情况。过去治黄河史的学者,惯于把各个时期黄河灾害轻重的原因,归之于时世的治乱和防治工程的成败。我觉得归之于时世治乱则与史实不符:实际上乱世黄河不见得多灾,治世往往反而多决多徙;归之于工程成败则于事理不可通,总不能说数千年来的治河技术一直在退步,贾鲁、潘季驯、靳辅等人主持的河工反而不及大禹和王景的工程有效。直到六十年代初我认识到黄河的决徙虽在下游,病原则在于中游黄土高原的严重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轻重与植被的好坏密切相关,而当地人民的土地利用方式则是植被好坏的决定因素。我抓住这一关键因素的历史演变认真做了一番探索,这才基本上找出了各个历史时期河患轻重不同的根本原因。写成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